

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及亞洲世界殖民歷史的一位作者及其著作：富雷塔斯的《澳門回憶錄》（1828年）

蘇一揚*

富雷塔斯於19世紀下半葉，出生於巴西的米納斯吉拉斯州。曾任炮兵上校及其所出生城市的檢察官。還曾在安哥拉出任軍職。晚年出任科英布拉民事長官。他後來出版了那本被視為最早澳門歷史的傑出著作。富雷塔斯在19世紀初葉，即1820年-1825年期間，在華南的這塊葡萄牙飛地上曾出任軍職。他對澳門甚感興趣，且有科學研究方法。不無受到當時權傾一時的雅廉訪議政大臣的“權威”的影響，多次對其加以政治讚揚，十分欽佩其社會保守性。此書題為《澳門回憶錄》，由當時科英布拉大學王家印刷所這一著名印刷機構於1828年在科英布拉印行。該作篇幅很短，僅94頁，但是整篇文章結構緊湊，無愧當時最佳作品，概述了他在澳門的個人、軍事與政治方面的經驗。¹其職業為澳門守軍炮兵營軍官。他當時的直接上司是桑帕約準將。直到1822年，富雷塔斯才被總督和議事亭任命為駐里斯本代表這一重任。富雷塔斯當時被任命為澳門的代表，前往里斯本參加國王唐若望六世²從巴西返回葡萄牙的慶典。富雷塔斯來澳門之前在葡萄牙其他殖民地的生平事跡不詳。他在這些殖民地都曾出任過軍職，但是很有可能富雷塔斯是那批至今為止研究不多的對巴西獨立有敵視的葡萄牙軍人團體的成員之一。後來這批從巴西撤退出來的軍人被分散到了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但是他們對葡萄牙的自由主義傾向抱有十分懷疑的態度。他與雅廉訪的保守思想志同道合。這位大法官是當時在澳門捍衛舊政權專制主義的大旗。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點的話，便可以提出上述看法。

* 葡國文化學博士（1993）。

1. 富雷塔斯《澳門回憶錄》，科英布拉，大學王家印刷所，1828年；席爾瓦《葡萄牙傳記詞典》，第4卷，第249頁。
2. 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澳門，教育與青年司，1995年，第3卷，第44頁。

但要著重指出的是，《澳門回憶錄》的出版實際上是一部編寫澳門歷史的巨大嘗試。如通常的情況那樣，一般來說，澳門歷史手冊或指南都將瑞典人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尊為開山鼻祖。³這本書出版於1836年，被認為是最早的關於澳門歷史的專著。初版為英語。1893年8月1日至1896年12月13日間，曾在《鏡海叢報》上連續刊登其葡語譯文，但只刊登了此書的第一部分。後於1909年，這部分譯文被收入由官印局出版的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論文集，再後殖民部外交地理及海事局於1921年在里斯本重刊上述論文集。然而，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一書在70餘年間一直被尊為澳門歷史研究的鼻祖，只有到了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⁴一書出版之後，它的地位才得到了動搖。然而，這本書的編年史部分卻有非常可取之處。富雷塔斯的《澳門回憶錄》出版於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之前，然而未獲龍思泰書那樣的成功，亦未在知識界產生那樣大的影響。只要讀一下這本小書，或許可以幫助解釋為甚麼它出版後即被人們完全遺忘，實際上，它是第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書籍。

地理與人口

如同一般的書籍那樣，此書首先介紹的是地理及地形情況。在第1章中，首先確定了澳門的地理位置，然後，在第2章中十分簡潔地介紹了澳門的範圍，“澳門不過一里格長，半里格寬，最寬處只有半里格。”⁵《澳門回憶錄》對澳門土壤的性質進行了非常有趣的介紹，解釋說澳門“系一濱海之地，土壤含沙質稀少。”優質腐殖土幾乎不存在。其開闢地面的優質腐殖土土壤深度只有3英尺。”同時，他還記錄說，澳門土壤的底層是黏土，大概有12-15英尺深。⁶整本書的寫作基點是圍繞個人興趣展開。這一章描寫說，“基督教居民住宅附近有幾個花園，但都很不起眼”，只有“議政大臣佩雷拉的莊園”⁷例外。第4章專論澳門

3.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波士頓，James Munroe 出版社，1836年。

4.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文萃，1990年（1902年初版；1926年二版）。

5. 《澳門回憶錄》，第3頁。

6. 同上，第4頁。

7. 同上，第5頁。

的魚類，行文短暫，只有兩行。澳門“海域漁業資源豐富，無論冬夏，魚質均佳。”⁸隨後筆鋒一轉，便進入了一個有點浪漫情調的對於泉水描寫的章節，實際上只有短短的三行。不幸的是，“(澳門)島當時只有兩口水井，並且都在城外”，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水源甘冽”。⁹隨後又開始了對港口的描寫，繼續簡單地解釋說，“港口是由從廣東方面流來的河流組成的”，“無供大噸位輪船航行的能力。”¹⁰

至於氣候，《澳門回憶錄》的作者特別強調說，“這是亞洲最好的氣候之一”。甚至他還見證說，“當地人壽命都很高。狹小的葡萄牙人圈裏儘管生活並不是很檢點的，壽命也很高。”¹¹接著開始了第8章，主要概述各種疾病。他的結論是，儘管當時“沒有甚麼流行病”，但是從1820年開始，澳門城便受到了線鼠疫的肆虐。他還認為這是“為人所不齒的‘民眾權力’¹²引發的令人滅頂的大道德災難的前兆”。而後，他的筆調平穩了下來，概述澳門的地貌情況。他認為，澳門“風景秀麗怡人”。在第10章中涉及了樓房。“在世界任何地方，從比例而言，沒有一個地方有如此之多的廟宇和修道院。儘管醫院條件不好，房屋建設不很規則，但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所見過的房屋裏面的家具之豪華無可比擬，沒有甚麼值得羨慕的，但它很奇特，的確是反映此地興隆程度的溫度計。”¹³

隨後，如同19世紀作品常用的手法，開始轉入對人口的描寫，包括了對人口數量的估計及對人口道德的研究，將倫理及人口相提並論。在19世紀的許多歐洲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寫法，例如，在馬爾修斯的奠基性文章中，可以看到一種純粹的因果辯證關係。他認為，人口結構不是基於社會人口因素之上，而是基於被工業化新風所挑戰的價值觀和文明的“狀況”。在1822年4月，澳門的

8. 同上，第6頁。

9. 同上，同頁。

10. 同上，同頁。

11. 同上，同7-8頁。

12. 同上，同9-10頁。在19世紀，葡萄牙保守派運動經常使用這個辭彙（ochlocracia）來指自由派。在《澳門回憶錄》中主要用它來指以部的是巴爾博札少校為首的反對廉訪的“派別”。

13. 同上，第10-13頁。

基督教人口分佈如下：在大堂區有289個14歲以上的男人，251個未成年人，1342個婦女及248個奴隸。瘋堂區有258個14歲以上的男人，170個未成年人，1058個婦女及236個奴隸。在規模較小的花王堂區只有59個成年年人，52個未成年人，301個婦女及53個奴隸。¹⁴至於華人口，與前面的“基督教”人口分類大不相同。《澳門回憶錄》估計華人總數在19世紀初已超過8000人。其增長是由於“澳門貿易所帶來的發展”，再加上當時“默許他們建立新的住宅和街道的不明智之舉”。¹⁵

此書關於居民人口的部分不甚關心居民的數目，然而更注重居民“文明”方面的考慮。富雷塔斯在其《澳門回憶錄》第13章涉及了基督教居民的體質特徵，將他們分為三個等級：“歐洲人，歐洲混血和亞洲混血。”按此三個等級加以敘述。

“第一等級最出名，無需贅述；第二等級膚色黝黑，很少不有那些白人和黑人混血兒或在可能的情況下，黑人同白人混血兒身上所具有的那些惡習；第三等級是人類中最不為人齒一類，因為他們不過是人類有機鏈中的一個環節。”¹⁶

上述歐洲中心論傾向的生理特徵分類具有十分明顯的種族主義意味。接下一章是“居民的道德觀”。他強調說，如果說“澳門土生還是有點精神的、謹慎的、正統的，因而可算作好公民”的話，那麼第三等級則保存了很大的華人道德遺跡。這與他們的生理特徵也完全符合。¹⁷

緊接著，他以對比的手法描寫了“華人的生理及道德特徵”。在最新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

“體高一般，手腳粗壯，臉盤寬闊，杏仁眼，但眼球凸出，即便從側面觀看的話，也可以看到眼睛的凸出，鼻子很小，兩眼之間無明顯的隆起，嘴巴也平平常常，然而耳朵卻又大又長，頭髮又稀又長，鬍子也很稀疏，皮膚黝黑，尤其是那些從事體力勞動者，有些人的皮膚

14. 同上，第15頁。

15. 同上，同頁。

16. 同上，第15-16頁。

17. 同上，第16頁。

接近古銅色，或者就是古銅色，然而那些生活安逸者根據其出生的省份不同，皮膚較白或呈粉紅。”¹⁸

對男性人類學特徵刻意描寫的同時，也對中國婦女進行了好奇性的描寫，其文字充滿了種族中心論和辛辣的描繪。他將中國婦女描寫為“身材中等，四肢嬌柔，鼻子又小又低，眼睛很小，與其說是老天恩賜給她們的，不如說是用什麼技巧弄成的那樣，櫻桃小嘴，唇部肥厚，頭髮漆黑，腳很小很小，因為從小開始（將腳骨打碎綁紮了起來）限制其發育，人稱中國愛神。所有的女人都使用胭脂，這樣便破壞了她們的皮膚。看上去令人生畏，如同我們國家的老婦。”¹⁹

顯而易見，這些對華人生理特徵的描寫不無種族主義的偏見。這是19世紀初歐洲准科學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偏見的通行寫法，但在作者的筆下，華人又被描繪成“從道德上而言”，是勤勞節儉的，但是華人“無從事科學的天賦，只有從事手藝及商業的天賦，儘管商業受到政治機構的蔑視。”²⁰同時，他對儒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卻不明白甚麼是19世紀華人傳統家庭社會機構中占主導地位的真正的儒家學說。《澳門回憶錄》以一針見血的口吻強調說，中國人“從不會偏離孝道”，同時，“他們又鄙視外國人和他們的風俗習慣。我不知道他們稱我們‘番人’有何道理。”然而，儘管有此道德背景，“他們唯一所崇拜的上帝便是他們願意付出一切的利益”，所以“中國人表面冠冕堂皇，客客氣氣，卻隱藏著相當多的陋習。”²¹

歷史及回憶錄性質的描寫

《澳門回憶錄》接著對澳門歷史著墨甚多。與當時時興的政治回憶錄緊密關係，有著黨派傾向。在第16章中，作者企圖以某種學術意圖來探討澳門“居留地的起源”。如同所期望的那樣，有知識的讀者及葡

18. 同上，第17頁。

19. 同上，第17-18頁。

20. 同上，第18頁。

21. 同上，同頁。

萄牙的文人被請來拜讀葡萄牙在全世界擴展的讚歌，同時用一種幾乎是巴羅克式散文的口吻，描寫了葡萄牙人在整個亞洲活動的情況。在此背景之中，專門涉及了小小澳門城的情況。在開始的文字中，這位有明顯傾向的作者便企圖強調說，葡萄牙人在華南這一飛地的“權利”，不是通過“征服”或“篡奪”而來的，而是一種“饋贈”。這便是澳門的起源。

迪亞斯率先，無畏的達伽馬繼後，他們開闢了通過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線。這樣造成了葡萄牙人征服遠方的癖好，同時也開闢了一種十分盈利的廣闊貿易。至其時，此種貿易僅為某些義大利城市發財致富的工具。眾所周知，從波斯灣到旭日東昇的東方的海域均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在此廣闊的海域內，有著不同的航道。然而，儘管澳門的出現是由於葡萄牙的政治英勇，然而這不是血腥篡奪或征服的結果。²²

從這一“論點”出發，作者再次回憶起了由佩雷斯率領的首次派遣中國使團的故事。這次使團失敗是因為安德拉德的“令人羞恥的過火行為”，使得“正經與和善的皮雷斯也受到了華人不無道理的反感對待”。²³接著說明與中國的貿易是在“上川的集市”進行的。一次“意外的事件”“為我們提供了神奇的澳門港”：

“一個名叫張西老的赫赫有名的海盜，是世宗年代的人。他當時佔領了澳門島，封鎖了珠江，同時死死圍困廣州城。官員為了擺脫這個強大而兇猛的敵人，光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請求我們的商人出手援助。我們的人捷報頻傳，最後終於將這個海盜殲滅於澳門。感於這一重大的效勞，流傳最廣的說法是，皇帝將澳門永遠地給予了我們的鬥士，但是也給立下戰功的地方規定了某些限制條件。澳門葡萄牙人為了讓這些戰功流芳百世，也接受了葡萄牙亞洲首都當局的領導。它為這個新生的社團作出了規定並予以援助。”²⁴

儘管此書採用的是習以為常的關於澳門起源的說法，而且在19世紀初年已固定化、官方化了，我們的作者還企圖努力進行自己的“調

22. 同上，第19頁。

23. 同上，第19-20頁。

24. 同上，第21頁。

研”，涉及了其他一些意見和在“當地”調查的結果。他認為澳門的起源更早，大概是在1521-1522年期間，然而儘管他的努力和仔細的閱讀，包括在“值得表彰的雅廉訪諄諄教導”之下的探索，這部作品未能夠嚴格地解釋清楚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起源，只能夠停留在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幫助廣東官員剿匪這一“大名遠揚”的說法上。澳門歷史聯繫最重要的一點肯定了下來。這是他編寫和出版此《澳門回憶錄》的目的：“瞭解並利用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東西。”²⁵

他繼續傳播這一對澳門的“認知”。《澳門回憶錄》的第17章過於簡明地概述了澳門的政府，只是點綴一下澳門議事亭所具有的中心作用。議事亭每年進行選舉，選出2個普通法官，3個市政議員及1個理事官。它在王室大法官的協助和總督及城防司令的“主持”下，領導澳門的政治生活。《澳門回憶錄》過多地強調了總督的主導性及其作用的權威，對澳門總督屬下的官僚機構也有詳述：“有一個無投票權的書記官，其正式職稱是澳門城少尉長，同時他還是財政書記官，還有一個出納。前者是不可罷免的，後者是臨時的。”²⁶對於司法管理的描寫也十分簡單，僅僅強調了民事法官和司法委員會的活動情況。司法委員會是澳門主要政治機構之一。尤其是在危機時期或在複雜的政治及司法案件的情況下，才啟用。

接下的一章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概述澳門城的貿易，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全面的報導。在同日本的十分昌盛的白銀貿易之後，“澳門現在已經只有危險的鴉片或阿芙蓉的貿易。”²⁷在概述這一複雜的貿易情形之後，第19章是用來概述當時的公共收入的，只是簡單地說，“公共收入起初只是一種自願性質的稅收，即在海關所繳納的鴉片稅。當時在澳門沒有其他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規費。”²⁸在描寫了澳門經濟問題之後，在極其簡短的第20章內注釋說，“當時公共開支估計為10萬西班牙銀元。”

25. 同上，第22頁。

26. 同上，第23頁。

27. 同上，第24頁。

28. 同上，第24-25頁。

在談完澳門經濟問題之後，下一章便詳細地描寫澳門的軍事城堡，“共有6座堡壘：大炮臺，東望洋炮臺，馬閣炮臺，西環炮臺，加斯蘭炮臺和南灣炮臺。”²⁹第22章僅一行，報導說當時的殖民軍部隊只有一個“400人構成的營。”³⁰在全書的尾注中，作者解釋說，“當時這個營的名字叫攝政王營，由1810年5月13日的特許狀成立。其士兵都是從葡屬亞洲首都運送過去的。都是那個地區最差勁的人。由於氣候的變化，他們實際上毫無用處。來回運送的費用及開支不小的醫院費用，還有招雇的費用都十分昂貴。”³¹

作者是軍人出身，曾經在巴西和安哥拉出任過指揮官，同時指揮過幾年以葡萄牙的名義駐札在澳門守軍。作者在其書中力倡一個葡萄牙在澳門駐軍改革的真正計劃。他解釋說，當時澳門城沒有軍隊，只有炮兵來守衛炮臺，同時捍衛澳門城的威望及治安。澳門城以商業為最主。一小部分當地人積極地從事海上貿易，但有相當一部分人無所事事。這部分人可以用來擴充當地的軍隊。這樣可以讓他們有事可作，停止遊手好閒。這一由當地人組成的部隊至少要有50-60名正統的葡萄牙軍人為基礎。此外，在這批葡萄牙本土來的人當中，還應該包括鞋匠、裁縫、石匠和五金匠等。這些人可以從葡萄牙來此服役一定的年數，可給予雙倍的軍餉或給予更高的獎賞。除此以外，澳門城便無法擺脫對華人的絕對依賴，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明瞭的經濟、政治及十分緊急的措施至今沒有得到實行或者被疏忽了。³²

在作出這些不乏對炮兵的讚揚，對無所事者的鞭撻之類的“經濟”與“政治”的當務之急的描寫之後，他在下面的章節中便談到了“教育機構”。《澳門回憶錄》涉及說，從1800年2月13日開始，將神學院教育交給當時在王家聖約瑟修院內的遣使會神父們。同時，他還指出通過1814年6月16日的王室決定，在板樟堂內成立了一所只有五個學生的宗教教育學校。在學業完成之後，他們將被送到帝汶差會去工作。”³³在

29. 同上，第 25 頁。

30. 同上，第 26 頁。

31. 同上，第 48 頁。

32. 同上，第 49 頁。

33. 同上，第 26 頁。

世俗教育方面，《澳門回憶錄》讚揚了“由1814年8月3日特許令開辦的王家水手學校”，同時，還贊助“一個拉丁文化老師”³⁴。在下面的第24章中，他報導了“慈善機構”的情況，除了歷史悠久的澳門仁慈堂外，“有一個由目前的主教管理的‘窮人儲金’，還有加上那些女子收容所、麻瘋院及棄嬰收容所。”³⁵他再一次按照前面涉及軍事問題時的筆鋒，對1569年成立的歷史悠久的澳門仁慈堂過分的仁慈行動作出了十分尖銳的抨擊：

“這一人類的勝利品僅僅是用來使葡萄牙民族的英名不朽，除此之外，它還要承擔醫院、月津貼等費用、要分發300-400份米。眾所周知，這在亞洲如同麵包。在澳門這樣一個人口低下的地區，婦女乞丐率卻很高。到目前為止，為何沒有想起設立一所勞動所，把施捨的錢用於維持這樣一個機構，不要用仁慈堂、教會及當地的豪門巨室來的錢來供養遊手好閒的人。”³⁶

我們不需要對這一《澳門回憶錄》的章節作全面的流覽，但是明顯地可以看出，此《澳門回憶錄》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澳門回憶錄》的本身便是一部政治作品和檄文。當時的背景正是澳門意識形態衝突的一個特殊時期。當時當地基督教精英集團的保守及專制主義傾向根深蒂固，與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產生了嚴重的對立。令人奇怪的是，附和自由主義的有某些軍人和宗教人士，尤其是多明我會會士。除了這些衝突的情況之外，澳門當時的政治情況的主要特點是在當地在中國官員的壓迫、勒索和控制之下。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以中國大皇帝的名義進行的。要概述19世紀初澳門“葡萄牙”的政治及政治機構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此外，這一《澳門回憶錄》實際上還要面對宗主國政治政權內部的讀者，因此更加棘手。

政治窘境

《澳門回憶錄》對澳門的過去及現在十分感興趣，對此問題專闢一章加以探討，稱之“為居留地的政治態度”。本來作者應該對歷史過去

34. 同上，同頁。

35. 同上，第27頁。

36. 同上，第49頁。

及澳門之未來提出個人的看法，但《澳門回憶錄》卻寧願大段地引用雅廉訪“在議事亭的一篇極力反對那些為澳門和王朝帶來了巨大和無法挽救的弊端的不謹慎的改革的長篇演講。”³⁷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是一長篇巨幅的保守派宣言。他一再強調的是已經歸結為專制君主制的“葡萄牙帝國”這樣一個陳舊的理念，但是他並沒有忘記以批評的口吻回顧澳門葡萄牙主權這一看法傳播的局限性。雅廉訪的演講詞藻華麗，表現出他對當時特殊及複雜的情況具有深切的瞭解，而這一情況正說明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是得到中國默認的。這篇演講如同一篇真正的政治宣傳，但實際上有許多關於澳門政治情況似是而非的連串疑問：

的確，我們享有特殊，絕無僅有的特權，但是為甚麼沒有人看到我們所受到的限制。至於華人間對我們對當地的擁有的嫉妒，因為他們不僅僅把我們視為走私物品的輸入者，而且是上帝聖教的輸入者，不是至今為止仍不斷加以迫害嗎？

哪有其他國家可以在北京各部有官員？幸好我們同他們保持溝通，儘管是非正式途徑。在他們那裏，我們擁有住院和教堂，擁有自由，可是僅僅限於住在他們所規定的範圍內，他們可以在那裏進行一些的政治性工作。只能偷偷摸摸、謹小慎微地來牧訪受到監察的基督徒嗎？帝國政府並不是不瞭解情況，當時我們在那裏設立教會，教授數學只是藉口，但是必須嚴格遵守他們的風俗習慣，否則後果不堪設想。³⁸

這些引入的問題，其回答十分明顯。雅廉訪政治演說的企圖是進一步詳細說明澳門城在19世紀初年政治狀況的主要難處。在葡萄牙人在澳門所享受的流通及定居的阻礙和限制之間，存在一種由於對天主教和他們的新目標忠實而產生的身份認同的危機。

“我們感到滿意的是擁有公開的教堂，並且有權利對它們進行修繕。在本城中，這都是到帝國政府允許的。³⁹我們可以公開進行我們的

37. 同上，同頁。

38. 同上，第28頁。

39. 同上，第29頁。

宗教活動。但是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我們處於異教徒居民的包圍之中，難道我主的工作人員可以不出頭露面而向華人傳授教義嗎？多少次帶來了危害，帶來了痛苦，他們被帶往中國的各個衙門，投進監獄，遭到拷打，不是這樣嗎？澳門主教區在中華帝國有很大的範圍，有哪個主教曾經前往中國進行過牧訪？除非他是中國人之外，否則必須秘密而行。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有宗教教育設施。由於我們虔誠信仰上帝的君主的寬宏大量，在那裏我們竟然可以接收中華帝國的子民，將他們交給堪稱為楷模的老師教育。然而，帝國的學生又如何可以保持一謹慎的態度？⁴⁰

這裏所提出的困難不是天主教在澳門行教的問題，而是天主教以澳門為中心傳教問題，涉及到當時葡萄牙人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因此，雅廉訪這篇宣言所強調的是，對葡萄牙人在澳門駐軍的最深層的限制。他再次拾起了以具體的歷史事件為明證而提出的不難答覆的問題這一慣技：

我們現在來看碉堡。葡萄牙國旗只有在這裡才在廣闊的中華帝國上空飄揚，但是我們不是不可以設立新的碉堡或是增加堡樓嗎？當今那個聖佩德羅炮臺的歷史足以證明這是真的，還有1809年孫總督去大砲臺那裏參觀時，無理要求我們將當時對準前山寨的炮口掉轉方向。我們有駐軍，同時它還負責城市的巡邏，但是我們不可以增加駐軍或者不可對中國人象對葡萄牙人一樣進行巡邏嗎？難道不需要通過某種手段來成立一個400人的營，其數目不是超過了駐軍的數量？有誰不知道那些巡邏及巡夜被動的情況？但願僅僅如此！有哪裡軍隊受到這樣的折磨？”⁴¹

接著，他的演講涉及了葡萄牙在當地的政治代表機構所受到的限制。儘管他讚揚了議事亭的政治工作及市政權力，雅廉訪再一次責問

40. 同上，第28-29頁。

41. 同上，第29-30頁。

了中華帝國政權及官僚機構給澳門議事亭的任期及活動強加的困難及限制。他說：

“並不是這一機構本身值得尊敬，1818年2月6日特許狀決定由著名法官管理，但並未因此不被迫要舉行那些令人難堪、屈辱的儀式。既然這些儀式是難堪、不合時宜的，那就要結束。難道說理事官不是縣令的一個下級官吏？實際上，他是縣令及其助手對澳門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及管制發號施令的對象。因此如前所述，他是一切與華務廳有關事務的唯一機構。所有的同帝國政府的官方信件往來必須通過此渠道。這是一種固定的模式，一旦改變，一切皆變。這正是在遇到某種重大事情的情況下，去覲見兩廣總督，必須通過香山縣令，然後由他們一級一級上達至那位最高首長。中華帝國等級是如何的森嚴！越級是犯罪。即便是申訴公文也是通過此種森嚴的等級來傳達。”⁴²

他繼續轉引雅廉訪這位權傾一時的王室大法官的政治發言。《澳門回憶錄》現在所強調的是任何一個以葡萄牙法律和機構為基礎的法律的共存局面所遇到的深刻限制。在此方面，澳門雅廉訪的宣言透露出來的資訊是，澳門的法律模式僅僅局限於被歸類為“葡萄牙人”的那部分居民。他說：

“我們對民事及刑事案件有非常明確的法律部門，但是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法院都不能管轄華人，即便他們是罪犯。有時，甚至是作為主犯。在辦案時，必須考慮到整個案件過程中的某些規定，以避免在其他方面可能出現的騷亂跡象。”⁴³

雅廉訪宣言最重要的一點是，全面地揭露了澳門歷史中心問題所受到的限制，即貿易問題。的確，澳門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貿易自由，葡萄牙當局只是局限於以中國皇帝名義嚴密控制的貿易體系之

42. 同上，第31頁。

43. 同上，第32頁。

中。船隻、貨物、航行、稅收、海關機構和商人均受到葡萄牙稅收、行政及官僚制度之外的各種嚴格限制。他說：

“我們有海關，但是其收入僅能夠維持自己的費用。如今海關是同公共儲金局相連，但是那裏只有來自葡萄牙船隻和來自馬尼拉有特許航行權人的收入。因此，任何一個涉及航行的改變都會終止海關的收入。一旦這個財源一斷，澳門會遭滅頂之災。任何一艘外國船隻免費下載部分貨物是違反常規的做法，需要謹慎從事，以避免中華帝國政府的干擾。即便是葡萄牙的航行也還是受到限制。即便是同屬於葡萄牙的船隻，這要看這是澳門的船隻，還是其他地方的船隻。只允許每年共計25艘船隻進入澳門，不論船隻大小。但是特別的做法是，從1到25加以編號。即便今日這些船、船主或船長仍然保持從本居居地開始便被丈量的情況，這樣船隻更換了的話，但其數目仍然不變。即便原號，原船主和原船長變了，中國海關的代理還是照原樣丈抽或徵泊稅！這種作假的手法誰人不知？但是有甚麼其他辦法做生意嗎？船隻一到，必須以船號報關。這樣便已經知道船的稅額是多少，同時還要附上貨物清單，但是不報中國法律禁止進口的物品，相反，可以證明說未載有違禁物品。在船出海時，即便是只有船員，也需要做同樣的申報，但與此同時卻每年運載幾百名華人。政府檢查人員不無收入。所有人都必須按照船隻的噸位繳納泊稅，然而澳門的船隻支付了第一次之後，在以後的航行中只繳納其第一次的1/3，直到其船號結束為止，然而所有的歐洲人需要全額付稅。除此之外，做生意還需要在廣州找一名行商作保。只有這些定數的人才可以同歐洲人交易。難道有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貿易、上貨下貨、為船隻聘請工匠和中國買辦，而不受到上述種種限制嗎？在澳門城的居民可以自由貿易，但如果是法律所禁止的貨物話，也必須經過上述手續，繳納各種過境稅，甚至還有可能保持中華帝國初期給與的優惠。如果是走私的貨物，不用？是要進行賄賂的。如果違反這些，會造成混亂。儘管雙方心知肚明，一有亂，本澳的貿易不是即刻停止嗎？”⁴⁴

44. 同上，第32-34頁。

這種對葡萄牙在澳門“主權”完全行使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種種限制還延伸到社會秩序及城市結構的其他方面。這種議定的葡萄牙人在澳門存在和居留的方式一直擴展到澳門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甚至擴展到澳門的社會諸方面，包括城市空間的開發。因此，雅廉訪這一系列具有政治意味的質問還突出了葡萄牙人建設住家的困難。的確，即便是按照本《澳門回憶錄》中刻意轉錄的發言文字，也可以看到下面的資訊：

“居民有自己住房，現在已經很富有、富麗堂皇，但是沒有人不知道他們曾經或正在遭受多少重建的困難。他們所需要的中國工匠不是需要得到他們的頭領的批准，而費用不是很昂貴嗎？新建是被禁止的。當時為了在澳門城牆之外建立居民點付出了多少要命的代價，即便是以新基督徒的名義申請的，難道華人不知這些房屋是屬於誰的嗎？”⁴⁵

在結束轉引雅廉訪的政治宣言時，強調了澳門對華人人工、產品及貨物的全面依賴。它已牽涉澳門經濟本身及其內部市場。

“我們有一個街市或稱集市。實際上，那裏每時每刻都有各種各樣的來自中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的給養及生活必需品。其價格、重量及尺寸窮富咸宜。本城政府在那裏出資按地蓋造貨攤和貨亭，供商販使用。並不是全部屬於華人的，但它們由中國官員手下的巡役管理，所以與我方發生不合時，它們必須關閉，根本不考慮到人們的需要，僅僅是逼迫我們就範。在文明國家的眼中，通常不是有失尊嚴的嗎？在本地隨時隨刻都有可能發生衝突。一個水手的酗酒，連一個奴隸酗酒足以使澳城陷於一時的混亂。如果發生了酒後殺死華人的事件，不是可以看到動用種種手段迫使立刻交出犯人嗎？”

富雷塔斯的《澳門回憶錄》舉出了這些例子，來證明雅廉訪的思想與政治活動的功績。這些問題和例子足以強調了澳門當時的政治狀況

45. 同上，第34頁。

是多麼的尷尬。葡萄牙所獲得的主權是十分有限的，而澳門這塊飛地是通過協商產生的，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式，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由中華大帝國政權及官僚控制的。《澳門回憶錄》的作者最“獨特”的貢獻在於，他將澳門政治方面這一似是而非的情況僅僅局限於一種能夠總結澳門這一飛地狀況的合適等級：澳門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生活是通過“一種華人控制外國人的體系”而運作的。只要看看“澳門這一居留地每年向天子交納貢金”⁴⁶，便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關於葡萄牙人在亞洲殖民的“思考”

從轉用雅廉訪這一政治演講開始，富雷塔斯的《澳門回憶錄》企圖對澳門在葡萄牙在亞洲整體情況中的前景做一預測。他在第26章中，加了一個長長的附錄，題為“關於我們在亞洲領地的總體思考”。《澳門回憶錄》的作者對當時19世紀葡萄牙在果阿、達曼、第烏及帝汶這些亞洲飛地的殖民活動進行了提醒人們注意的批評，為上述地區以澳門作為一個新的政治及經濟關係體系的軸心的經濟和貿易發展，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在進行此類思考時，這位曾擔任澳門上校的軍人一開始便批評葡萄牙人統治下的亞洲各個領地政治及軍事殖民的狀況，認為過分地依賴於禁止體系。他強調說：

“對這種禁止體系所產生的衝突效應，在我們在安哥拉作為志願軍居留期間，深有體會。這對於宗主國來講，是一件大壞事。對於我們的居留來講，是致命的，尤其是對我們在亞洲的領地。在亞洲的領地，我們必須使用那些可以通過他們的道德和教育獲得當地人友善及好感的人。至今當地人為歐洲的道德淪喪而衝擊。在亞洲，歐洲的道德遠遠無法保持。送往各個殖民地的流犯對祖國沒有任何好處，降低了宗主國原來已經低下的人口，而殖民地又不會因此而人口興旺。培養一個人至少需要20年的連續不斷的支出。葡萄牙只有300餘萬人口。如果當時

46. 同上，第40頁。

的公共道德有意進行此種懲罰，那還好，但是我們可以看看，如果不進行這樣的懲罰，對社會會產生甚麼影響？這些居留地的自己守軍都是一副罪犯的樣子，我們的居留地的氣候與“植物灣”那裏的氣候大不相同，這裡有變化(值得奧維德謳歌)。那些本來行為不軌的人，成為了優秀的家長，進而成為了優秀的公民。否則，如何解釋為甚麼仍然人煙稀少？此種人只有在其全面發展的地區以外的地方，才會有所作為，但是我們筆下所描寫的是一小部分人。他們擁有很難確定是幸福還是不幸的準確思考。”⁴⁷

在對面積狹小的亞洲飛地內開始的葡萄牙殖民進行批評後，《澳門回憶錄》的作者為我們做了一個這些地區經濟方面的全面介紹，企圖為對增強殖民開發的討論鋪底。因此，在涉及葡萄牙在果阿的統治時，《澳門回憶錄》僅僅強調說，這個地區“所生產的咖啡很少，而且稱咖啡為‘沒卡’也不很恰當。它生產椰子、火藥、一些繩索及優質油等，但產量還可以提高，可以成為中國貨物的轉運站。不僅僅是針對沿海地區，還可以向內陸銷售。同時，還可以為巴西運輸線上的消費者提供貨物。”⁴⁸至於第烏，作者比較詳細地概述了第烏保衛戰、當地的強國及競爭的情況。《澳門回憶錄》建議說，“我們所有的居留地中，沒有一個可以立即並容易地加以改善。如果生產者不是受到迫害，而是得到保護，如果沒有一群明火執仗的強盜，派遣秉公辦事的總督和官吏，情況會大不相同。手工業將是其財富的來源。其產品在東非銷路很好，更不用說在古吉拉特生產的鴉片。它當時未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嚴格的限制。”⁴⁹接著是達曼這一飛地，“它可以進一步發展造船業，可以為果阿的繩索提供一個比較近的市場，同時因為當地的勞動力非常廉價，可為國家海軍提供大量的船隻。世界上最好的木材柚木可以繼續利用。還有鴉片貿易及棉花貿易，由於我們一貫的忽視，現在已經全部落入了英國人之手。如果這種貿易成本不是這樣高，而且旅行安

47. 同上，第56-57頁。

48. 同上，第58頁。

49. 同上，第58-59頁。

逸的話，那麼可以同孟買的市場競爭。”⁵⁰總而言之，對葡萄牙在帝汶的情況的評論一派批評的口吻，且語氣幾近猛烈：

“在我們所有的領地中，帝汶最貧困。且不用說那種一直統治它的不公正的體系，當我們戰勝了自然的障礙，有膽量來審視它的時候，才可下手寫出來。其位置已經向水手們表明，它是漫長的中國航線上躲避季風的一個舒適的中轉站，其地位說明澳門應該與它締結更多的政治關係。帝汶那裏的產品，如檀香、蜂蜜等在澳門銷售很好；帝汶的土地十分肥沃，棉花、甘蔗，幾乎所有的植物在那裏都生長茂盛；帝汶蘊藏金礦，可與巴西媲美；還有許多無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尚且未知的寶藏。”⁵¹

總而言之，這是葡萄牙在亞洲各個領地的“概況”。《澳門回憶錄》以當時仍然在葡萄牙控制之下的地區間貿易聯絡結構的總體介紹為結束。一般而論，富雷塔斯描繪了一個貿易和交易額不大的海上貿易景象，但是著重突出了澳門的軸心地位：

兩至三艘船由此每年前往孟加拉。那些經常進口的貨物價格暴漲，但還是運來了印度棉織品。迄今為止，非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人只能用集市的方式。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消費者以極其昂貴的價格購買質量極其糟糕的產品。這還要考慮到昂貴的停港費，恒河的危險，更高的保險費以及那個國家昂貴的排場用費，還有疾病的麻煩，例如腺頭鼠疫等。中國限制我們的航行只能有兩或三艘船，最多四艘小船。一般來說，這些船運輸的貴重金屬（交換中國貨的最佳物品）不多，同時還有用處不大，甚至無用的貨物。交換來的貨物都是劣質的，此外價格又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這裏的貿易情況同對孟加拉貿易情形的描寫相同。同時，還有壓制在外國市場上競爭的企圖。這些不利的情況主要是圍繞著兩個方面：一是投機，

50. 同上，第 59-60 頁。

51. 同上，第 60-61 頁。

二是進口貨物的質量問題。這造成了很多交易的失敗。這使人們想到了一些經過孟加拉購買鴉片，前往中國進行貿易的船隻。另外一些是經過馬尼拉，當時馬尼拉的市場對我們工業產品比較接受，目的是為了能夠在那些港口進行較好的貿易。然而由於在這些港口的停留，費用會增加，而且要交付更高的保險稅。這幾乎沖抵了所有的利潤。最後便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價格貴質量差的問題。”⁵²

儘管簡短，這些總體的考慮對葡萄牙在亞洲地區和市場的考量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既負面又受到種種局限的局面。葡萄牙幾乎永遠喪失了在亞洲國家之間交易的主要角色，已經失去了它作為向歐洲世界販運東方產品主要的角色。荷蘭和英國所成立的強大東印度公司已經取代了葡萄牙貿易在整個16世紀所獲得的仲介的作用。至其時，葡萄牙控制之下那些為數不多的飛地的經濟利用也是有限的，後來發生了嚴重的蕭條和分崩離析。《澳門回憶錄》的作者以他在澳門的政治、軍事經驗為基礎的，最好地見證了上述情況。他不僅僅對葡萄牙19世紀在亞洲的情況作出了一個總體的概述，同時還企圖建議經濟出路和取代方法。然而他的選擇既不創新，更不消說新穎了。實際上，是17世紀和18世紀的改良主義和重商主義思潮的翻版：建立一個在中央政府保護之下的貿易公司。這是促進和更新葡萄牙在東方貿易的最後一招。

再論那個永遠構思中的“公司”

《澳門回憶錄》第27章全部是關於設立和發展一個葡萄牙對亞洲貿易公司的計劃。富雷塔斯行文起始便列舉了一個新的公司所能夠給越來越不平衡的葡萄牙在東方經濟活動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好處。這些總體的考慮不乏對英國模式的採用。這一章強調說：

“當歐洲大部分商業國家考慮到將這些專營公司作為在亞洲貿易的最佳、最有效手段，當考慮到這些國家中那些最富裕的

52. 同上，第62頁。

國家是貿易最發達的國家，儘管它的政治機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具有自由傾向，似乎應該對貿易有所限制，但卻容忍，甚至有效地推進它們的東印度公司。這一巨大的模式古無先例，亦非雛形，但它現在已經在廣泛的地區中擁有貿易和統治。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不僅僅要看到它的表面，同時也要考慮、權衡並分析每事的利弊，要考慮到在政治經濟學家熱心提倡的體系中引入改進的必要性，因為已經無法適應這些貿易不可謂之不長途性質的貿易所帶來的坎坷，其經營的對象是與我們的習慣與宗教格格不入的各族人民。”⁵³

因此富雷塔斯極力主張建立一個葡萄牙對亞洲貿易的公司。《澳門回憶錄》的作者，在其書中，為促進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的經濟勾勒了一副藍圖，企圖將印度洋的貿易與南中國海的貿易聯繫起來。至於這一公司在非洲的分支，他建議說，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應該儘量開發“其豐富的金礦、象牙、玳瑁、烏木、貝幣、魚翅等。這些都是在亞洲集市上最受歡迎的貨物。捕鯨及馬拉巴兒和古吉拉特的貿易都控制在巴內阿內斯商人手中。”⁵⁴接著在談到果阿經濟時，他說這一新的公司，應該吸引“那些精明的巴斯人。由於他們對政府濫用權力行為的恐懼，不在當地投資，這我們必須予以承認，當時不允許到偉大的阿爾不爾克的墓前去要求伸張正義。最後，果阿是中國產品的一個集散地。”⁵⁵在第烏，亞洲公司可以開發“棉織品工廠，用其產品在東非進行交換，這一貿易現在已經完全掌握在上述巴內阿內斯商人手中。這一市場可以擴展到西非，同時也可以從事鴉片貿易。可以將第烏作為向古吉拉特和紅海提供中國貨物的中繼站。”⁵⁶最後，在不受人們注意的帝汶島，公司可以將那裏開闢為“從東部前往中國或逆季風而行的船隻的停泊地。帝汶有檀香、蜂蜜、金礦。那裏容易生長甘蔗，可為製作燒酒

53. 同上，第 64-65 頁。

54. 同上，第 70 頁。

55. 同上，第 71 頁。

56. 同上，同頁。

提供原料等。”⁵⁷接著，達曼也是葡萄牙亞洲公司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達曼的造船業很好，對鴉片走私不進行任何控制，比進行棉花交易還容易。為我們的工廠提供素色布匹的生產者在那裏，同時它也是中國貨物向坎貝海灣銷售的中轉站。”⁵⁸對這一系列商業飛地情況的考慮幾乎都是以它們同中國和澳門的貿易為基礎的，這樣他又提出了葡萄牙在亞洲新商業秩序經濟中“極地化”的概念，因為澳門地區“給葡萄牙遠東公司提供了最好的鴉片市場，利潤豐厚的象牙、玳瑁、棉花、海參等等交易市場，還是購買中國貨物的首選之地。不僅僅可以向亞洲小型的商業中轉站供貨，同時可以向美洲大量銷售，甚至為對歐洲提供貨源。”⁵⁹

可以看到，設立這樣一個葡萄牙遠東亞洲公司目的是富雷塔斯在他的《澳門回憶錄》中提出來的，其重點是廣泛地建立一個對華貿易的商業網絡，充分利用澳門的地位和澳門的仲介所提供的方便。這一中心目標在《澳門回憶錄》下面幾章裏，尤其是在涉及成立以兩個基本產品——鴉片和棉花為中心的交換系統時更加明確。

兩個基本產品——鴉片和棉花

《澳門回憶錄》第28章專門論及“鴉片或阿芙蓉”。應該注意的是，這是一部在葡萄牙出版的《澳門回憶錄》，其作者時任科英布拉行政長官，其目的是引起能影響被忘卻的殖民地發展問題給予一定重視的文化及參政人士的注意。同時，這一作品出現的背景是葡萄牙殖民思想創立的時代，一個以廣泛的商業開發為目標的時代。同時，他想以此引起企業家和當時鉅賈的注意，因為在巴西獨立之後，迫使葡萄牙必需對其海外經濟活動進行重新調整，因此，成立一個亞洲貿易公司最

57. 同上，第72頁。

58. 同上，同頁。

59. 同上，同頁。

終來講具有具體和盈利的意義。鴉片貿易成為首選的盈利項目。《澳門回憶錄》如同是一個鴉片貿易歷史小結，說明了它迅猛的商業擴張及明顯的利潤：

“約60餘年以來，這一商品輸入中國市場的數量一般很少超過200箱或擔，隨後逐漸增加，時至今日，其消耗量已經超過6000箱，其中4000箱來自於孟加拉，餘下來自其他各地。價格也飆升許多。開始每箱的價格是200西班牙銀元，現在已經超過了2000西班牙銀元。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了此項貨物在孟買的交易，設立了一些拍賣點出售這些貨物。這樣一是保證了質量，二是保證了數量。交易以封箱的方式進行。封箱運到中國銷售。每箱是40坨，總重量是100市斤。”⁶⁰

接著，《澳門回憶錄》毫不掩飾地指出鴉片貿易在清朝是完全非法的，然而禁而不止，到處氾濫。他同時對人的“本性”和中國各個社會階層普遍抽用鴉片的情況，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其《澳門回憶錄》解釋說：

“如同上述，鴉片貿易在中華帝國是受到嚴格禁止的。即便在鴉片裏摻入了其他成份，其效果非常有害，但是抽食鴉片已經成風，置一切國家峻法於不顧。可以相信，鴉片的抽用正在日益增長。大小官員都在抽鴉片，就是在朝廷裏面也是煙霧繚繞。人，不管是甚麼地方的人都是一個樣！禁止只能是抽刀斷水水更流。通過抽鴉片可以得到快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抽鴉片者擺脫這條歧途！”⁶¹

這樣鴉片為整個中華帝國各個方面形成了一種深深的社會和文化吸力。《澳門回憶錄》展示了英國人在鴉片貿易方面所取得的驚人利潤，建議將成立的葡萄牙亞洲公司應該以澳門為基地，展開對亞洲貿

60. 同上，第73頁。

61. 同上，同頁。

易。同時，應該儘量利用這一貿易，這是非常賺錢的買賣。在葡萄牙位於大西洋的海島上有種植鴉片的優良條件：

“澳門商人對鴉片的暴利早已虎視眈眈，已經無人作其他生意了。英國人也希望撈一把，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允許。這使他們在1780年利用兩艘停泊在位於澳門南側的一個海灣上建立了一個海上倉庫。這一海灣有兩個名稱，或是JIN‘黑色黃油’海灣或是‘英國人’海灣。但是由於海上風浪險惡，他們於1794年派了一艘滿載阿芙蓉的船隻抵達了黃浦。他們在那裏逗留了很長時間，以便進行貿易。這種貿易雖然有時受到官員的禁止，但是一直在進行。官員禁止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敲詐錢財，而不是為了嚴格打擊走私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82年賺了1200萬盧比，利潤是700倍，因為種植及熬制鴉片所需要的費用幾乎是1/700！這一驚人的利潤刺激了我們預想設立的公司不僅僅要包括大部分北部的鴉片，同時也推廣可以提取鴉片的罌粟花的種植。在聖托港島那裏也進行了象亞速爾一樣的種植鴉片的實驗。那裏的土壤可以說是沒有東西不長，也不會排斥此種種植。”⁶²

關於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國南海之間盈利頗豐的貿易情況也在第29章中得到了概述。這章主要是針對棉花貿易。只有通過這些具體事實，才可以理解為甚麼要建立葡萄牙東方貿易公司。它不過是一種失之於烏托邦和英國人在亞洲盈利豐厚的貿易之間的模仿品。《澳門回憶錄》的作者不知道，更未找到大英殖民帝國和葡萄牙殖民帝國之間在經濟及政治機構方面的區別，只是將其計劃建立在葡萄牙重新振作空泛的道德及政治美好願望之上，其基礎是已經失去了的有利歷史契機。在19世紀頭幾十年，這一想法是同英國資本主義產業革命與瘋狂的其亞洲殖民地的原料出口相聯繫的，例如以印度土地上生長的棉花用來供應英國和蘇格蘭大城市的紡織工業。《澳門回憶錄》對此複雜的新經濟形式樂此不疲，尤其強調了英國人在棉花貿易和棉紡織品生產

62. 同上，第75-77頁。

中所獲得的巨大利潤，因此，建議只要葡萄牙在亞洲的各個飛地稍微參與一下這個利潤巨大的經濟活動，便可以獲得一定的利益：

“對華貿易最近發展巨大。由於人口的必然增加使得其內部市場對棉織品需要進一步擴大，因而出口量一定會增加。與此同時，棉花的種植與此情況並不是同步發展的，受到了華人重視種茶葉的影響，這樣必須進口棉花。不久前只進口3萬包。每包重300-400鎊。現在的進口已經超過了20萬包。大部分都是由黃浦入口的，因為從澳門進口的每年不超過2萬包。視貨物的質量及當時的行情，普通價格為12-14兩或1000雷伊斯一公擔。在黃浦不需要繳納入口稅，在澳門按每公擔800雷伊斯的價值交納6%的稅或為390鎊重的棉花包支付1500雷伊斯。這些貨物都是由英國人設在加爾各答和孟買的兩個大倉庫輸出的。那裏肯定有訂單，然後通過英國船隻運輸到中國。只有輸入澳門的是由澳門居民的船隻裝運的。不管是懸掛英國國旗，還是懸掛外國國旗的船隻，從英屬印度的各個港口運出棉花不交任何的出口稅，然而從某時開始，外國船隻被課稅。從內地，通過蘇拉特、讓博塞拉、巴羅車等港運輸到坎貝海灣的棉花每提包需要繳納12阿納斯或6%的關稅。

眾所周知，那裏無此產品。這一稅額在加爾各答海灣進口時，亦按坎迪爾準確估價從棉花中扣除。來自蘇拉特和巴羅車港的除外。出口商僅支付6%的出口稅，入口孟買時則免稅，只需要支付1%的其他費用，然後得到規定的繳稅證明。儘管這一稅不是由買方支付的，但並不因此不打入貨物的成本，因而在那個市場上價格有所提高。這些貨物都由運費高的達曼駁船運到那個市場的。運到我們的這領地更便宜，因為它靠近運河。”⁶³

在這些建議中，沒有提出任何振興葡萄牙在亞洲各個飛地殖民經濟的特殊計劃，而是對大不列顛帝國在東方的經濟活動及其資本貿易公司體系的蓬勃大加讚賞，認為這一切都應該為葡萄牙的殖民計劃所效仿和採用。在通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主要的思想：將澳門

63. 同上，第77-79頁。

變成葡萄牙在亞洲世界貿易活動和投資的基點。這面旗幟實際上是《澳門回憶錄》的主題，是全文的要點。實際上，這正是十分明顯的澳門歷史命運的“歸宿”。

作為亞洲貿易心臟的澳門

在其《澳門回憶錄》終結部分，作者在第21章中論述了“在澳門貿易的方式”。企圖以一種並非明瞭的方式來鼓吹澳門航行與貿易的長處，甚至將對貿易機制的限制及中華帝國的控制視作為某種穩定性。澳門海關體系十分複雜，受到中國當局的嚴格監控。《澳門回憶錄》的作者竟然發現，在同以廣州為中心的港口貿易中，甚至有可能進行各種走私活動。

在廣州，丈抽較少。只需要保持船號，也就是說保持總的25艘船隻。這是澳門城的特權。在第二次航行的時候，只交付第一次丈抽的1/3。只要某艘船隻存在，其船主或代理人便可以將報單作為護照使用。向中華帝國政府申報船隻的目的地，而保持同一的官方收費標準。這是從澳門居留地建立以來便實行的制度。至於要裝運的貨物，要搬入海關。可以在最佳時機出賣貨物，而不需要經過那些帶有侮辱性質的行商的插手。這對交易大有裨益，在此所支付的稅率低於廣州，而且有利於中國人走私，矇騙各個關口的負責人，將貨物輸往中華帝國各地，然後再將貨物輸入澳門。澳門海關既無入口稅，又無出口稅。”⁶⁴

澳門的此種從政治承諾到貿易流通的特殊性使得《澳門回憶錄》的作者得出結論說，他所建議成立的那個葡萄牙亞洲公司要將葡萄牙屬下的殖民地的港口，通過澳門港口所具有的特權聯繫起來：

“綜上所述，莫桑比克有提供亞洲市場的最佳物資。第烏是大型船隻的最好停泊點，同時它還可以為繼續航行的船隻提供給養，提供對東非貿易所需要的棉織品，同時也可以將其貿易範圍擴展到西非；阿芙蓉可以輸入中國；第烏可以作為中國貨物的中轉站，向古吉拉特東南沿海、庫特查海灣、波斯灣及紅

64. 同上，第82-83頁。

海等提供產品；達曼可以成為整個坎貝海灣及印度斯坦內陸的中轉站；鴉片；我們的工廠所需要的素色布匹、棉花、優良的造船業；如同果阿一樣，我將考慮嚴肅地進一步推進我們這些領地的貿易，至少可以吸引部分歐洲和美洲人歷盡千辛萬險和耗費鉅大到加爾各答進行的貿易。由此深入印度斯坦內地的距離與從我們這些已經被遺忘，但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地方的距離一樣。澳門既是出售非洲物品的最佳市場，同時也是購買中國貨物的最好市場。可以設想發展對巴西的貿易，同時打入整個歐洲的市場，等等。”⁶⁵

嚴格而論，成立一個葡萄牙東方公司是一個簡單而受到限制的計劃。這在富雷塔斯關於澳門的《澳門回憶錄》中，均有簡述。除了將澳門這一飛地改變為葡萄牙在亞洲貿易的心臟這一想法之外，其他的想法，對未來的計劃，尤其是葡萄牙人在東方貿易中嚴肅的政治、經濟投資的計劃非常稀少。對這個預計成立的公司如何使用其資金未加說明，不知其運作方式，人員或設備，對其地位、規定、法律狀況亦無隻字涉及，因此，這只是一個流產的介乎於烏托邦、漫長的隨意性歷史及重商主義之間的一個無法成功的計劃。直到19世紀末，仍不可能調動葡萄牙的殖民經濟。這一殖民經濟只是運輸和補充銷售促進了北歐的工業化的巨大開發機制所生產的產品。或許《澳門回憶錄》的作者當時已經充分意識到，他的《澳門回憶錄》僅僅是一項文字性工作，而不是針對當時已經是葡萄牙在亞洲邊緣性殖民活動所面臨那些重大的難題和挑戰。其書結尾語，無論就其《澳門回憶錄》的“夕陽”性質而言，還是對葡萄牙領地的“不幸”而言，都是斬釘截鐵：

“這不是一種烏托邦……這是一種地理性質的想法，混合了亞洲貿易的概念。我們在這一個小冊子中，僅僅指出了明顯的事實。這樣它或許可以為我們不幸的領地建議設立更好的機構，恢復一個可為宗主國的繁榮作出貢獻的貿易。然而，如果這一切無法實現的話，我們也並不會認為我們用於寫作這一《澳門回憶錄》的時間是白白浪費了。努力必定會成功。”⁶⁶

65. 同上，第83-84頁。

66. 同上，第85頁。

